

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回顾与思考

陈 弘 卢秀玲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发生了首次论战。此次论战围绕“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还是“正统”这一焦点展开，涉及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党与阶级基础的关系、“毛主义”的胜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对首次论战的回顾与思考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国外毛泽东研究，而且对促进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毛泽东研究 “毛主义” 农民阶级

作者简介：陈弘（1964-），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卢秀玲（1982-），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0）。

一、论战的主战场及两大流派

1960年，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①创办的《中国季刊》在英国伦敦大学创刊，对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思想^②的研究随即成为其创刊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突破点。1960—1969年10年期间，《中国季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论文38篇，成为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的“主战场”，一方是以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为代表的自由派，另一方是以德裔美籍学者卡尔·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

史华慈被称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的“直系学者”。195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③。在这篇论文中，史华慈创造了“毛主义”（Maoism）这一概念。在1952年与费正清和康拉德·布朗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④中，

①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毕业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建的东亚研究所，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主要关注“文化大革命”研究。

② 在我国，“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及党的建设理论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指毛泽东个人全部思想的总和，既包括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接近于后者。

③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④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史华慈进一步阐释了“毛主义”的概念。自由派学者认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毛泽东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该书标志着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发生“范式转变”，即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传记和媒体新闻报道的形式走向学术研讨的形式，从此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进入学术研究时代。

保守派的核心人物是魏特夫。他出生于德国，曾经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并因这个身份被纳粹关押。出狱后魏特夫改变了政治立场，开始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持敌对态度。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魏特夫的理论一度成为美国保守派中国问题研究的风向标。魏特夫认为，“毛主义”不过是在苏联操控下的共产国际的复制品，是苏联在远东的“阴谋”，是史华慈杜撰的“传说”，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

自由派与保守派围绕“毛主义”展开的辩论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首次论战。1960年，《中国季刊》第1期和第2期相继发表了魏特夫的《“毛主义”的传说I》^①和《“毛主义”的传说II（结论）》^②，对史华慈所阐述的“毛主义”概念提出异议。同时，《中国季刊》第2期还刊登了史华慈回击魏特夫的《“‘毛主义’传说”的传说》^③。随后，在《中国季刊》第4期上，双方又在《“毛主义”：“传说”还是“‘传说’的传说”》^④中总结概括了各自的观点，美国学者亨利克·夏德马在《“毛主义”的实质》一文中对双方的立场做出评论。

二、论战的主要问题

1. 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在史华慈与魏特夫关于“毛主义”相关问题的争论中，农民阶级的地位问题是核心问题。史华慈指出，“毛主义”创立的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革命潜力的发现以及动员。史华慈认为，毛泽东主张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革命活动的中心环节，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阶级身上。“他深信农民能够独立担当实现全部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推动力，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表达过这一信仰，后来则学会用必要的马列主义推理来表达。”^⑤这一认识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赞同。在对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革命理念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布朗特得出了毛泽东“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⑥的结论。后来，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也提出，毛泽东“对农民主导作用的强调构成其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⑦。

按照史华慈的说法，毛泽东“革命要依靠农民”的观点并非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传统。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史华慈认为“在取得列宁主义形态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农民阶级被认为

①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1960.

②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Conclud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③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④ Karl A. Wittfogel, Benjamin Schwartz and Henryk Sjaardema, “‘Maoism’ – ‘Legend’ or ‘Legend of a Legen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 1960.

⑤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78–179.

⑥ 王文涛：《“毛主义”话语权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⑦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不是人类历史上一支独立的有创造性的力量”^①。后来史华慈着重对“独立的”和“有创造性的”这两个词汇进行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即“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农民既不能改造旧的生产方式，也不能创建一个可以代表其自身阶级利益的国家”^②。史华慈的解读十分鲜明：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即使农民阶级可以参与西方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或者亚细亚国家反对君主专政的革命，但是，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地推翻旧有的经济基础、建立本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更进一步，从列宁主义的角度看，史华慈指出，列宁对于农民阶级作用的认同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马克思在其理论中对农民作用的“无视”使列宁抛弃了民粹主义，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自1905年农民阶级在俄国显示出革命力量后，列宁对农民的积极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开始倾向于弱化农民阶级的作用。因此，史华慈得出结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理论视野中，“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无法得到解释。

魏特夫则认为，毛泽东对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态度并不坚决，至少是摇摆不定的。“对于农民革命潜力的评论，毛采取的态度介于宣传上的极端主义和某种保留之间。”^③“宣传上的极端主义”是指，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把农民阶级看作反对封建主义的“先锋”均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呼应；“某种保留态度”是指，出于维护国共合作的考虑，毛泽东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土地问题。魏特夫还指责史华慈对毛泽东的农民战略发端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事实重视不足。为此，他在《中国季刊》第1期发表的《“毛主义”的传说I》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民阶级在反对专制主义的社会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本论述来证明。他依次提到：1856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④；恩格斯在谈论农民在欧洲三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作用时说，“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指出，因“处于半封建依附状态的农民能够出色地领会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所以“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并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⑥。由是，魏特夫的结论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理论严格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观点是遵从共产国际指导和顺应时局的政策调整，而非“异端”。

2. 党与阶级基础的关系

史华慈认为，毛泽东将革命的主力军角色分配给农民阶级，把民主革命胜利的贡献70%归功于农民，30%归功于无产阶级和军队，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分离趋势；1932—1933年间，中共中央委员会总部从上海转移到苏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与城市无产阶级正式分离的标志。无产阶级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正如史华慈所说，“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政权的那些年里，它与城市无产阶级分离的事实毫无遮掩而且无法挽回地从所有掩盖策略背后显现出来”^⑦。史华慈对这种“分离”的解释是：其一，在农村确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概念指向“党和群众作为真正的集体的无产阶级道德品质”^⑧，而不再是一个通过生产关系来定义的范畴，

①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17.

② Benjamin Schwartz, “The Legend of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③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Conclud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3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8、279页。

⑦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7.

⑧ 转引自史华慈：《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选自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颠覆；其二，在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落后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少而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将视野转向了有着更大群众基础的农村。

史华慈强调，在列宁关于党与阶级基础关系的论述中，“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共产党可以脱离其无产阶级基础而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暗示”^①；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尽管党组织可以吸纳农民阶级加入，但必须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样一来，史华慈以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再次证明“毛主义”的“异端”性。

而魏特夫对列宁关于党与阶级基础关系的阐述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自己理论的混合体。恩格斯曾经说，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列宁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先锋队‘职业党员’的特征不是指他们的社会阶级身份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而是特指他们是否具有可以恰当引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阶层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② 魏特夫还指出，在列宁的理论中，“未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的要素存在于‘所有落后的国家中’；这些尚未发展起来的组织也可以‘不仅仅在名义上是共产主义的’。在适当的指引下，它们会‘按照共产主义的策略与政策行事’，但只有在它们‘与农民运动有明确联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③。因此，魏特夫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可以不是无产阶级，这并非如史华慈所说是毛泽东的首创。从党与阶级基础的关系及其理论来源看，“毛主义”并没有超出列宁主义的理论外延。

3. “毛主义”的胜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主张以城市无产阶级为暴动主力的城市中心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迫于形势共产国际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的必要性以及苏区和红军的合法性。但是，无论是对农民阶级地位的认可，还是对苏区武装力量的肯定，共产国际始终坚持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阶级必须配合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攻占城市。基于此，史华慈从理论上否认“毛主义”是共产国际设计的结果。显然，将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核心、将土地革命视为革命的任务、将夺取农村看作革命胜利的开端，这些“毛主义”的革命战略无疑都是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挑战。从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行动上看，毛泽东也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言人给予强有力的抵制。因此，史华慈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赢得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凭借的是以自己成功的战略所造就的实实在在的军力、财力和人力。权力转移到毛泽东、朱德手中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环境和权力关系的结果，而不是莫斯科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④。美国学者保罗·科文等人曾就此赞誉史华慈是“第一个以充分的文献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听命于斯大林和苏联的傀儡，而是有其自己行动方案的学者”^⑤。

魏特夫则坚持，“毛主义”是在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共产国际授意下制定并实施的，其胜利是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战略设计的结果。以建立农村苏维埃为例。魏特夫指出，列宁曾提出，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相对于工农苏维埃，他更倾向于建立“农民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的巴库会议、1922年的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建立“农民苏维埃”均被提上议程。魏特夫坚持认为，毛泽东提出并建立的农村苏维埃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实现的，这个建议的提出和农村苏维埃的真正

①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92.

②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1960.

③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 1960.

④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7.

⑤ Paul A. Cohe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Memorial to 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2000.

建立不可能脱离俄式革命的影响。所以，在魏特夫看来，“毛主义”中农村苏维埃理念的源头自然是来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支柱的共产国际的指导。魏特夫还举例，在面对武汉反革命政府的无情镇压时，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毛泽东却号召农民要忍耐，要对政府有信心，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毛主义”视野下毛泽东的行动准则。究其原因，魏特夫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做出这一抉择，是因为迫于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党继续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不要过早地与之破裂的压力。这一战略选择及其被迫实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大林想要掩盖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结局以及与托洛茨基斗争的政治需要。因此，魏特夫得出结论，“从1928年开始，当毛泽东上升到中国共产党的高级职位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变得更为成熟，更为显著的正统”^①。从列宁主义的角度看，这里的“正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列宁“农民苏维埃”主张的贯彻；从当时共产国际（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总部与支部关系的角度看，“正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4. 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

自由派学者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新民主主义论》视为“毛主义”形成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启了“毛主义”式的中国革命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又不同于俄式革命的独特按钮。费正清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史华慈则强调毛泽东在其中对农民革命潜力的发现、对农村革命高潮不断兴起的赞扬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独特趋向”的表现。费正清还认为，撰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摆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地位，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②；史华慈则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不再满足于用莫斯科的“联合阵线”来解释他的战略，历经种种艰难困苦磨砺之后的毛泽东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进行理论创新。

而魏特夫不承认上述两篇著作的里程碑地位，认为这两篇著作的“创新性”并不成立。魏特夫提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受到共产国际主席的高度称赞，由此推测这个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里一定得到了广泛传播；他也坚持认为，毛泽东本人从来无意将自己描述成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比肩的理论家。据魏特夫考证，自由派强调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涉及的“毛主义”的核心内容——土地革命和领导权问题——是毛泽东出于政治原因在1951年的版本中添加的，在此前的版本中并没有出现^③。关于《新民主主义论》，魏特夫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领导力量和革命前途等问题的阐述，其直接来源是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论据是：1905年列宁就提出了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及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俄式革命对东方落后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阐述都是坚持和发展列宁思想的体现。魏特夫还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

①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Conclud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②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③ 从1927年毛泽东撰写完成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确实经历了不同版本的修改过程。最原始的版本陆续发表于1927年《战士》周报第35、36、38、39期；稍晚汉口长江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后经历了1942年被编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时的改动，40年代在根据地、解放区出版的几版《毛泽东选集》中的修改；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直至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最终版本。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调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应该看到这是图书出版的惯例，随着作者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演变，在图书再版时对原有内容或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常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客观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因素，文中提到的土地革命、领导权问题在1927年的版本中确实没有提及，究其原因，既有当时国共合作的历史前提的约束，也受到陈独秀与毛泽东在革命理念上的分歧的影响。关于土地革命和领导权问题并非如魏特夫所言是毛泽东在1951年增加的。其实，在1942年《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及其后的版本中，毛泽东已经逐渐将这些问题增补进去。

话来维护他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的”^①。至此，魏特夫指责道，“《历史文献》的作者们意识到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主制度理论来源于列宁和斯大林，却仍然声称《新民主主义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了新贡献”^②。所以，魏特夫断定，史华慈等人所看重的上述两篇文献的里程碑意义不过是一个“传说”。

三、对首次论战的思考

如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谱系的角度来评价这场论战，那么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毛主义”是“异端”还是“正统”的问题；这场论战不仅开启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理研讨形式，而且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自由派强调，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也偏离了列宁主义；“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永恒原理”基础上的“分裂”，至少是“朝向分裂”^③。保守派则认为，史华慈论证的“毛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错误理解之上、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概念。从实践上看，“毛主义”是毛泽东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国际路线、苏联指挥乃至是苏联“远东阴谋”的产物；从理论上讲，“毛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正统”体现。

1. 首次论战奠定了国外毛泽东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

与之后发生的几次论战^④相比，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首次论战虽然在理论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稍为逊色，但是，作为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展开学理性研究的开端，这次论战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作为国外毛泽东研究核心概念的“毛主义”是首次论战爆发的关键因素，“‘毛主义’是否存在”显然是进一步研判“‘毛主义’是什么”以及“‘毛主义’是什么样的”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前提。尽管经过这次论战“毛主义”是“异端”还是“正统”依旧莫衷一是，但是“毛主义”概念在首次论战中的出现以及论战双方就这一概念合理性的辩论为国外学界进一步展开对毛泽东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前提。

通过这次论战形成的自由派学者更是成为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坚实推动力量。国外毛泽东研究首次论战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恰逢中苏关系恶化的关口。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阴谋论”的落寞；自由派则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国外毛泽东研究学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学术派别。除了前文提到的自由派学者外，在首次论战的影响下，美国毛泽东研究的知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莫里斯·迈斯纳接受了自由派的基本主张，从此开始专注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成为继费正清、史华慈之后的自由派的中坚。在这个领域内，自由派学者深耕不辍，贡献了举足轻重的研究成果，助力自由派成为美国乃至整个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流，极大地推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9页。

② Karl A. Wittfogel, "The Legend of 'Maoism' (Conclud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 1960, p. 27.

③ 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01-202.

④ 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其他几次论战分别为：1976年“左派”与自由派就“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的第二次论战；1982年苏联学者单方面驳斥欧美学者遵循“心理历史分析法”分析毛泽东的第三次论战；1986年国外学者就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开展的第四次论战。此外，还有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围绕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国外毛泽东研究出现了第五次论战。

2. “异端”与“正统”之争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过程,是不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自由派认同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历史背景、实践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差异性的判断,却得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异端”的结论。自由派指出,毛泽东极为重视农民问题,在革命实践中强调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据此他们明确“毛主义”战略下中国革命与俄式革命的根本区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中国,在革命力量处于弱势、强大的敌人集中在城市的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对城市包围的革命形势,最终夺取城市及全国的胜利。在自由派看来,“毛主义”的“农村中心论”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的差异显然是对“异端”说最好的注解。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异端”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充分体现。强调“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异端”的自由派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作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理论,而是形而上地将其视为静止僵化的理论。当毛泽东针对中国的特殊革命实际提出不同于马克思或列宁所主张的革命策略时,即使这种策略的提出是建立在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基本理论原则的基础上,自由派也只是观察到“毛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式差异,从而教条地认为“毛主义”超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成为“异端”,却未发现恰恰是这种“异端”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相反,与自由派对立的保守派在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实际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毛主义”与经典作家理论观点和共产国际战略的一致性,从而认定自由派的“异端”说不过是“传说”。保守派不但无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所谓的“正统”也没有给予适当的理解。事实上,这种“正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对经典理论的坚持与继承。

毛泽东在1935年就曾明确说过,“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①。显然,无论是自由派认定的“异端”还是保守派认定的“正统”,都没能真正参透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展示出的与时俱进的理论素养。

3. 辩证地看待文本研究

20世纪60年代,当国外毛泽东研究实现由新闻报道向学理研究的转变后,文本研究方法成为国外学界对中国及中国革命领袖研究不可或缺的方式。此次论战中对立双方都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试图从中寻找能够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依据。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特别值得国内学者学习,提醒我们必须以扎实的文本分析来推进理论研究与创新。恰如习近平所说,“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虽然文本能够向人们展示理论“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文本的使用不当所带来的弊端。习近平强调，“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①。这是因为在使用文本研究方法时，研究者常常会主观地收集对自己有利的文本作为论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于是可能对经典文献做出断章取义式的解读。在这次论战中，双方都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文献中找到了翔实的文本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文本成为驳斥对方的尚方宝剑，却忽视了文本背后更具本质意义的理论原则。例如，双方都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农民观的维度去衡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观，也没有从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角度去权衡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而是一味地引经据典。这种对文本的过度依赖和不当使用所暴露出的问题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前车之鉴。

4. 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辨析国外毛泽东研究

参与这次论战的双方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论战过程中双方所意图捍卫的观点必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特别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这些观点加以辨别。

比如，史华慈武断地认定，将农民作为革命先锋、党中央由上海迁往苏区，意味着“毛主义”战略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脱离了无产阶级。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其无产阶级性质——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的判断不能仅仅由党是否在城市从事革命活动、党领导的革命主力军是否来自无产阶级就能简单做出，更关键的在于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党的指导思想体现哪个阶级的世界观、党的纲领为哪些阶级而定、由哪个阶级执行等等。诚然，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但不能把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重视等同于与无产阶级的脱离。事实上，毛泽东一直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天然联系，始终要求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和教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旗帜从党成立至今从未偏离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要求。仅仅凭借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权力中心地理位置的迁移就做出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相脱离的判断，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得出的错误结论。

又如，坚持反苏、反共立场的魏特夫断定“毛主义”不过是“传说”的一个突出理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苏联的阴谋下展开的。这样的结论除了“笔墨官司”的学术之争，魏特夫敌对的政治立场也是我们在评价其学术观点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中是与其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使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将中国看作苏联的卫星国。持这种立场的美国学者不愿承认“毛主义”中创新性要素的存在，把“毛主义”看作马克思、列宁以及斯大林阐述过的理论在中国的翻版是他们的“正常”结论。我们对这种学术研究的政治立场要有充分的警觉。

参考文献：

- [1] 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 [2] 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 [3]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
- [4] 路克利：《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5] 梁怡：《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编辑：刘曙辉）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